

金额越来越高，纠纷越来越多…… 直播打赏该怎么管？

不久前，33岁的网红女主播“豫北女保安”赵冯冯不幸遇害，犯罪嫌疑人是她的“粉丝”，曾为其打赏不少。

“线上刷得爽，线下悔青肠。”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一些主播靠打赏赚得盆满钵满，但围绕直播打赏产生的各类纠纷也日益增多。

► 越来越高的金额与越来越多的纠纷

“守护主播就送她一个‘热气球’”“家人们留下你的‘小心心’”……进入直播间，观众通过直播平台购买虚拟礼物，再兑换成虚拟礼物赠送给主播。靠着打赏，不少主播钱包鼓起来了。

在网络直播热潮中，打赏、带货是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与带货相比，靠观众刷礼物、“榜一”（给主播打赏最多的人）豪掷千金，成本更低、钱来得更快，因而更受大部分主播的青睐。

一位网络视频公司负责人向笔者坦言，近两年来，直播业务中产生纠纷最多的就是打赏，其中不仅有用户起诉主播的，也有用户的配偶、父母起诉主播的，“而且这类纠纷原因复杂，处理的难度也比较大。”

笔者近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以“直播”“打赏”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299篇文书。其中2017年及以前仅有33篇，而2019年至2020年纠纷数量快速上升，2019年270篇，2020年达到551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直播打赏动辄豪掷千金，高额打赏直播情况频现。在多个直播平台做过主播的胡女士告诉笔者，“用户一次打赏几万元也正常。”此前一名“90后”出纳甚至挪用4826万元公款，一年多时间打赏主播2000多万元。

今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规定，网络表演者不得以语言刺激、不合理特殊对待、承诺返利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但笔者在多个平台观看直播发现，主播直白地要求打赏的情况十分普遍，有主播表示打赏到一定数额就展示才艺，有主播表示送个“热气球”就可以加微信好友。业内人士说，“语言刺激”实践中很难定性。

为诱导打赏，一些主播“花样套路”频现。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捣毁了三个以女主播身份引诱男子进入直播间平台，营造所谓“打赏PK”氛围诈骗钱财的犯罪团伙。“像直播间的打赏‘气氛组’，便是直播套路之一，很容易营造出一种争相打赏的环境，满足打赏者的攀比和虚荣

心。”受访专家表示。

一些主播还经常使用各种套路诱导“粉丝”打赏，如隐瞒婚嫁状况、营造“单身”人设，打赏达到一定金额给予“粉丝”不同称号，假“粉丝”豪刷礼物骗其他人跟风打赏等。

► 未成年人打赏、“私相授受”、逃税等问题凸显

在众多直播打赏纠纷中，未成年人打赏、下播“私相授受”等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笔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直播打赏”发现，前20条纠纷中有12条投诉都与未成年人打赏有关。虽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规定，未实名认证的用户不能打赏，未成年用户不能打赏，但笔者发现，仍有很多未成年人绕开“青少年模式”为主播打赏。

一位家长告诉笔者，近日自己7岁的孩子玩手机给主播打赏礼物，在某平台充值15128元，且主播存在诱导充值行为。家长向平台电话举报后，“客服一开始同意退款，但后来又找各种理由不退，说无法证明是未成年人消费。”

下播“私相授受”也是监管的“灰色地带”。笔者调研发现，在直

播过程中，有主播会明示或暗示“榜前10可加微信”。某网络视频公司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情感暗示”“打擦边球”是直播间吸引打赏的常用方式，加微信也是刺激打赏的重要手段。加微信后，用户行为很难监管，易引发涉黄案件、经济诈骗或涉人身伤害等犯罪问题。

此外，直播打赏收入还可能存在偷逃税款问题。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目前对于直播打赏等新型网络收入的纳税申报与监管体系尚存部分空白。

“线下或线上购物，我们都可以要求商家开具发票，但在游戏中消费或在直播平台打赏给主播，却时常遇到难以开具发票的情况。”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从屹表示，新型网络收入在纳税申报与监管体系上存在的空白点，不仅可能使消费者遭受损失，还可能产生洗钱等风险。

► 推动直播打赏冷静期落实到位，督促平台规范打赏行为

今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38亿，占网民整体的63.1%。

直播经济火热，营造清朗运

营空间势在必行。

业内人士建议，应将直播打赏冷静期落实到位。早在今年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必要时设置打赏冷静期和延时到账期。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等指出，直播打赏冷静期目前落实尚存在差距，“设置冷静期，可以防范非理性打赏，有助于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其次，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直播平台监管，督促平台对打赏上限、到账时间等予以规范。目前微信公号上单个用户对单篇文章的打赏上限是256元，且7日后才能结算，微信红包也有限额。从屹等专家建议，直播平台可借鉴微信平台的一些做法，为直播打赏设定额度上限，并延时到账，或者要求大额转账打赏的用户进行单独申报，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防止出现网络诈骗等情形。

北京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传文提醒，网络主播要增强法治观念，不能为了吸引“粉丝”打赏而虚构个人资料。成年观众也应理性消费、理性打赏，在主播和平台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一般不能要求退还打赏款项。（新华社 白佳丽 刘惟真）

新一轮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 已追缴各类文物2.1万余件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记者 翟翔 熊丰）

2020年8月31日，公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部署开展了新一轮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各类文物犯罪案件2704起，打掉文物犯罪团伙58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368名，其中抓获公安部A级通缉令逃犯22名，追缴各类文物6.1万余件。

记者从公安部12月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此次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掘石窟寺石刻、盗窃古建筑及其构件、盗窃损毁革命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据了解，这是公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部署开展的第4轮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2021年8月，经报党中央批准，两部门召开工作推进会，将此次专项行动延长一年，突出打防并举、以防为先，进一步加强文物犯罪的防范工作。

抚顺市东洲区 打出社会治理“组合拳”

“感谢街道帮忙协调化解邻里矛盾，让上夜班的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东洲街道金秋社区居民李某感激地说。

原来，李某楼上邻居王某的小孙子在家里总是跑跑跳跳影响李某休息，李某找了几次也没有效果。无奈之下，李某来到社区寻求帮助，东洲街道得知后立即协调东洲派出所、东洲司法所参与调解。最终，王某在家中铺设了泡沫垫避免发出噪音，双方达成和解。

这起纠纷的妥善解决，是东洲区委政法委加强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如今，在东洲区区委政法委统筹推进下，“党建+六长制”“1+1+1+14”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四级调解员”工作机制等层出不穷。

近年来，东洲区积极创新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在章党街道试点运行“党建+六长制”成效显著。目前，“党建+六长制”已在全区推广，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

据介绍，“党建+六长制”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由街道（乡镇）正职领导即党委书记任总长；街道（乡镇）的副职领导即班子成员任片长；社区民警任社区（村）网格巡查长；社区书记任社长；社区（村）干部任网格长；退休老党员、老干部、积极分子、乡贤能人以及各志愿者任楼长。

“党建+六长制”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社会服务“零距离”、基层治理“全覆盖”、民生诉求“快响应”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

在东洲区东洲街道创立“1+1+1+14”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的亮点之一。

实践中，以街道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14个社区组成立体式矛盾纠纷排查网络，主要职能是指导督促各社区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同时针对辖区内存在的矛盾纠纷案件定期召开会议研判推进化解，通过联动有效避免辖区内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及命案的发生。

据统计，今年以来，通过“1+1+1+14”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东洲街道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共化解矛盾纠纷52起。

（《法治日报》韩宇）



12月13日，广西南宁明县东安乡党委政府组织乡派出所、乡司法所及乡直有关单位，利用东安街圩日联合开展以“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为主题的反邪教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防邪、反邪意识，营造浓厚的防邪、反邪社会氛围和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图为东安乡反邪教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反邪教宣传册。
周刚刚 何志宽 摄

山东：助人为乐 扶危济困 温暖齐鲁

守护红色革命资源 行政公益诉讼 内蒙古五原县：

为切实提升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水平，今年6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部署开展全国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要求发挥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作用，推动解决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烈士纪念设施、捍卫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

内蒙古五原抗日烈士陵园是国家AAAA级景区“内蒙古五原抗战纪念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二批国家抗战纪念馆设施、遗址名录之一，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巴彦淖尔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及五原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

2018年，五原县检察院对县内红色资源进行摸底排查时发现，陵园内纪念碑和英雄烈士的墓碑、坟冢油漆严重脱落，杂草丛生。五原县检察院立即着手探索开展英雄烈士公益诉讼保护专项行动。

三年来，该检察机关先后进行2次公益诉讼立案，制发3份诉前《检察建议书》。据介绍，该院检察长督办，分管副检察长多次召开案件专题推进会议，公益诉讼办案团队与有关部门对接，数次实地监督整改进度，始终紧盯案件的整改进度，坚决进行跟踪监督。县委县政府对检查机关的这起公益诉讼案件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题协调，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对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

据悉，五原县抗日烈士陵园英雄烈士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地区首例英雄烈士保护案件。这也是第一起由县政府主动牵头参与，历时时间最长，整修面积最大的保护红色资源案件。（人民网 李楠楠）

每天天不亮，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田苑生活小区一处租来的小院内，薛城区长途汽车站职工侯成芹和丈夫孙琦早早起来淘好豆芽，到市场卖钱补贴家用。

在这处小院内，住着19个残障孩子，他们共同的“妈妈”，就是侯成芹。

借钱成立枣庄市智培残障人士关爱中心，主动学习专业知识，耐心给孩子们清理大便、洗衣服、做康复……从一个孩子的妈妈，变成很多孩子的“妈妈”，侯成芹日复一年地劳作，为孩子们能有尊严地活着、能融入社会而无私付出。

前不久，第八届山东省道德模范60人名单正式发布，侯成芹等16人获评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我希望能有个更大的院子，让孩子们活动空间更大一点；我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这些孩子。”12月5日，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侯成芹告诉笔者，希望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唤起更多人对志愿工作的关注，吸引更多人当好好人、做好事。

浸润在传统美德中的齐鲁大地上，有许多怀着道德义务感主动向他人提供帮助的平凡人，他们把助人当作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最美国丁”吕文强，在这位平度市朝阳中学退休教师的帮助下，原来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学生最终被重点高中录取；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发挥特长，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

各类雷锋书籍物品、雷锋事迹故事连环画……在荣成市崖头街道沽河社区居民戴玉山眼里，可都是“红色传家宝”。1994年退休后，戴玉山就成了专职“寻宝人”。20余年里，他骑行10万多公里，光自行车就骑坏了9辆，“淘”回党史资料、实物等两万余件“宝贝”。

时代在变，红色“宝贝”的价值

不变。戴玉山说，退休后他共投资400万元，卖掉3处房产，还自费举办了300多场抗日战争资料展览。“我不为名，不为财，就是为了传承党史，为了提醒大家别忘了来时路，别忘了自己的初心！”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物业公司员工吴守林45年来无偿操办了355对年轻人的婚事，并为318位老人送终。“我的道具比婚庆公司的家什还多呢！”照理说，义务帮忙的事，操心受累就足够了，他却搭工又搭料，先后投入4万多元购置了各类婚礼庆典道具，足足占满一间储藏室。

面对事后送红包、烟酒致谢的，吴守林一一婉拒。用他老伴儿的话说：“老吴就想报答社会、教育后人，收钱、收物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

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扶危济困。他们是普通人，来自各行各业，没有豪言壮语，却默默奉献、热心助人，用爱心关怀世界，用行动温暖人心——

扎根基层敢拼善闯、将老旧小区打造为示范社区的田象霞，

捐髓救人、带动150余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的霍中祥，扶贫济困、做红色文化传播者和热爱公益志愿者的左文平，组建团队、动员家人、用实际行动擦亮志愿服务品牌的王福卫，开办免费养老院服务乡村教育的李济远、单美华，奋战防疫一线、书写最美“逆行者”慷慨壮歌的贾庆臣，诚信经营回报社会、投身公益扶危济困的爱心企业家李双举，创建爱心食堂、只为老年人一餐热饭的滕兆敏，为孤贫儿童提供心理辅导、被称为“孤贫儿童引路人”的徐军，成立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义务帮助被拐卖儿童父母寻亲的郭刚堂，千封信万里路、为39位烈士找到“家”的张景宪，在平凡岗位上无私奉献、被称为车站“活雷锋”的索建民……

凡人善举擦亮了“厚道齐鲁地，美德山东人”的亮丽名片，凝聚起温暖力量，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大众日报》张兆友 赵琳）